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复问孝。孔子曰：“今之所谓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以敬事父母，是谓孝也。”子游复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声乐 艺术 笔记

韩乾 著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中行）子游问孝。孔子曰：“孝子之至孝也，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孝也，莫大乎无违。”

GUANGXINORMALUNIVERSITY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S H E N G X I J I D O N G

生
死
志
东

——一个90后的思想笔

韩乾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西击东：一个 90 后的思想笔记 / 韩乾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495-3802-7

I . ①声… II . ①韩…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052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2.75 字数：306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 册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韩乾的这部书稿让我颇有些吃惊的，作者虽然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但其哲学素养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了解，相当深入；还有分析问题和写作表达的能力，都远超大学哲学专业本科生的水平。除了青春的锐气，我还很欣赏作者的思想力和对概念的把握能力。看得出他阅读的宽广和深入，他不仅深入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社群主义、激进主义或一些不宜归类的思想家也都有较深的了解，对中国现代历史也相当关注，而且始终是秉持一种自由思考和独立批评的精神——包括对他心仪的一些思想家。

作者的基本立场或观点是相当清晰的，他谈到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乃至“对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还有译为“自由至上主义”，我更倾向于译为“自由优先主义”)抱有相当的亲切感”，“对科学沙文主义和民粹倾向的非精英民主”“怀有敏锐的警惕”。而从作者对中国现代思想谱系的叙述来看，他也是赞成“五四”的启蒙，认为其方向还是我们

有待争取的未来。他主张限制政治权力，包括缩小政治领域，对中国现代史的理解也相当别致，认为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史“首先应该被理解为政党力量逐步支配社会的历史”。谈到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是“狭义的政治吞噬了广义的政治，也即，现实主义的政治吞噬了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政党组织，其首要任务即是争取实质权力；因此，它们先天就趋向于以严密替代松散、以单一替代多元”，而当其兴起壮大之后，社会的力量也的确难以与之抗衡。

作者在《正义战争与政治虚无主义》中写道：“我们想必都会认同‘正常社会’这一概念。它表明，存在着某些共同而普遍的律则，当一个社会违反这些底线时，便不能被称为‘正常的’，其政治也不能被认可为正义的。这一标准即是：社会能否为个人选择与多元文化共存提供足够大的空间；个人能否有足够的自由选择他/她所期望的生活，以及诸种文化、诸种价值观是否可以得到公正的对待、是否得以免遭政治权力的干涉。换句话说，当政治能够为上述标准提供保障时，才是正义的。”亦即作者认为自由多元的价值共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而政治制度应当是保护这一基本特征的，为此，就应当将政制与善观念进行分离，即现代政制不应再是促成某一种善的（价值）观念实现的手段，这也应该被理解为“现代性的核心取向”。

在我看来，作者的这些思想特质都是相当宝贵的：他的哲学分析的能力，他对历史的关照，以及他明显表露的西方学术的视野和深藏于心中的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我自然也看好他的思想潜力和未来发展。但是，在此我也愿意就他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有些可能是引申或强调，有些也可能是批评或希望。

强调现代政制与善观念的分离，或者说政治与单独一种广泛完备的价值理论或观念体系的分离，以及政教分离，并不意味着对制度的正义

或者说制度伦理乃至对所有个人行为的“正当”的道德评价的缺席。使“正当”(right)独立于“善”(good),乃至优先于“善”,从而使政治与某一种“善”的观念脱钩,恰恰是现代道德的“正当”或“正义”在政治领域的一个首要要求。如此,政治也才能保障自由多元的价值共存,或者说各种合理价值的共存和自由竞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不必讳言政治的道德性,不必讳言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的紧密联系,甚至可以像最强调价值多元的一位现代思想家伯林那样,将政治哲学就看作是伦理学的一部分,虽然这种伦理学不是那种依附于价值观念的传统道德、个人道德,而是与正当、正义观念紧密联系的现代伦理、包括制度伦理。对一种较好的政治制度的信心和支持力量,其实也首先乃至主要是来自这样一种认其为正义的道德信念。

现代政治不宜是某一种罗尔斯所称的全面和完备的价值理论或宗教信仰的工具,但两者之间肯定还是会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或是一种历史的或逻辑的引申,例如现代自由主义也是从古典的比较完备的自由主义发展过来的,历史上有过一种理论的引申,当代如罗尔斯则更强调一种范围的限定;或是一种后面的精神信仰的支持关系,例如基督教与法治的关系,“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是可以给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以强大的支持的,且历史上法治的形成也的确和宗教有过不解之缘;或是一种可以调整得相容的关系,例如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与现代自由民主政制的关系,前者的确并不包含后者,或者说后者并不能够逻辑地从前者引申出来,但是,依据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固有要素,是可以将其调整得与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不仅互不冲突,甚至给予某种根本的价值思想的后援的。

这就要涉及我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成长的一点看法了,它为什么显得相当弱小,为什么在这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敌激进

主义,更曾在经由激进主义而最后达到的极权主义压迫下几乎一度消失殆尽?这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而从其自身这方面的原因来说,我认为有两点是可以反省的:一是它的激烈反对传统;二是它的强烈拒斥宗教。它放弃甚至赶走了它本可有的同盟军或后援力量。严苛一点地说,甚至可以说在这两方面它与它真正的对手并无二致。而且,有些遗憾的是,在它重新开始生长之后,一些热爱自由的人们似乎仍没有深刻地觉察到中国上世纪的自由主义的这样两个思想盲点或弱势,且不谈宽容或容忍本就是自由主义内核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保障自由多元的价值共存本就是自由主义的要旨。当然,更希望的是还能对中国的传统及宗教的信仰有较深的理解和体验,不是说要或者能成为其信徒,但是,这种体验将至少能带给我们一种对它们的尊重。

还有作者对自由选择和价值多元的强调,这固然是自由主义的一个要义,我在此只是想提醒一下自由多元的复杂性。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否多数人比少数人更看重物质而非精神,更看重安全而非自由,更重视奇迹而非理性?如果确是这样,在一个多数意见支配的社会,多元就可能变成实际上的一元:即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盛行,成为价值追求的主流,从而让另一些人(一些少数)失望或者感到压抑;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即许多人在一段时间里受“奇迹”(“人间天堂”或“领袖魅力”的诱惑而失去自己的正常判断力,或者在安全与自由两者相冲突的时候放弃自由,甚至在这之前就逃避自由。当然,在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和复杂性之后,仍然致力于捍卫所有人的自由选择和社会价值的多元是可贵的,也是正确的,但提出的理由就要更复杂一些。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挑战性,这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社会抱有一种恰如其分的期望,知悉单纯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对的,但却可能是不够的。

在文体方面,我注意到作者的文章似乎越到后来越学术化,越来越进入一种细密的分析。如果走学术的路,这是一种必要的功夫,但学术的路也将是一条漫长的路。严格的学术要求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趋深入和比较系统,但也可能因此失去一些读者。但是,作为学术论文,又还可以比现有的文章有更细密的分析论证和更严格的形式要求,而如果是评论,则可以更为犀利和生动有力。如果作者能够善用两种文体,且明确地将两者区分开来自然更好。

总之,我希望韩乾这位年轻的朋友能坚持走自己的路,保持一种坚定性,同时也保持一种开放性,除了更加大量地吸取新知和进行思想的持久训练,其写作也可能会慢慢融入自己对人性复杂和人生沧桑的体验和认识,这样不仅写作的风格,思想和观点也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另外可能还要经受一些时间和事件的考验,而我倒是希望作者能坚持目前的基本立场,但又能不断将其扩大和深化。

何怀宏

2013年春于褐石

目 录

自序 /1

第一部分 一本正经

古今之争：基础主义之思 /5

静态世界与政治理论的维度 /16

现代性：历史，或者一个故事 /25

“政治成熟”：关于一种教条与偏见 /29

自由主义及其副现象 /35

重思中立性论题 /40

自由主义与平等理想 /52

政制与公民资格 /57

无干涉的权利与反至善论的政治 /61

论退出契约 /67

自然禀赋应得问题 /77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85	
重思支配概念	
——对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的评论 /103	
为自由意志主义申辩：效益辩护与两种自由观 /110	
The Webs We Weave	
——对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的评论 /117	
以赛亚·伯林：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 /131	
“我没有敌人”：论施密特 /139	
帝国：关于一种政治解释 /143	
意象癖 /148	
论费耶阿本德：两个非关键问题	
——对保罗·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的评论 /154	
霍克海默：启蒙理性反思与现代性批判 /162	
法律、社会偏好与承认的政治 /168	
自由主义与族群歧视问题 /173	
私人国家：承认与自我统治 /177	
两种自由 /181	
再论两种自由：能力、意愿与自我决定 /185	
消极自由有什么错？ /190	
正义战争与政治虚无主义 /199	
平庸之恶与政治神学 /205	
后无政府主义希望 /211	
无政府、国家与政治义务 /219	
自由意志、自主与现代性批判 /234	

取消物理主义与解释空缺论题 /242

自愿为奴与践诺义务论题 /256

第二部分 三复斯言

自由主义与理性多元社会 /263

理性设计:政治理论漫谈 /267

垄断与言论自由 /269

强迫垄断与效率垄断 /273

深刻的失败

——对约翰·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评论 /276

民族主义笔记一则 /279

民主与“观念的暴政” /282

现代性的地平线 /285

很多人成为左派都是不由自主的,但是 /288

观念史二论(一):民主与宪政 /291

观念史二论(二):自由与传统 /294

儒学的政治之维:公羊学与现代世界 /297

屈原、儒家与撒娇文化 /303

儒家范式:阐释与反思 /307

良心论政与制度反思 /311

作为目的或者手段的政治 /314

烛与灰:宗教与文化散议 /316

私人阅读与思想启蒙 /323

政治正确与自我消解 /326

乌托邦：漫长的告别 /329
意识形态与历史的终结 /332
大众的幻象 /336
中东问题两文 /340
九十年前的未来 /346
政党与学生运动的变迁：对现代史的一种整体理解 /349
“侠”、“非侠”与“反侠”：金庸的武侠世界 /355
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潮流：评述与反思 /362
内容、逼真度、理论更替与科学进步 /369
拉卡托斯论“迪昂-奎因论题” /378
方法论与归纳原理 /381
如何批评分界标准？ /383
经验科学的方法与知识问题 /386

声西击东(自序)

据说,我们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于是,我们善于并热衷在言论领域与别人论辩,试图纠正对方的偏颇看法,传播真相,并捍卫自己对祖国的正确理解。这项活动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成为自上而下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同时,在各种场合中,对一个国家之历史与现状的论断,又从未像今天这样易于引发争议。当面对如此情境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殊异身份就显得具有特别的作用。因为我们时时刻刻居于这个国度之中,时时刻刻体认着它的现实境况,我们的利益又与其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似乎理应是当代中国最深刻的理解者、最合适阐释者。

没有人会怀疑:对一个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了解它。我的疑问是,是否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居民就是最了解该国家的人。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一命题显得尤为可疑。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一生中仅读过一本书,他整日、整年沉浸在这本书之中,以至于对其内容倒背如流。

于是，我们就此得出结论：他是这本书的最权威的专家、“最深刻的理解者、最适宜的阐释者”。然而，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人只读过一本书，他甚至无法从直觉上说出它的好坏来，更别提进一步的判断了。任何判断——价值判断——都必须建立在比较之上。没有这种比较，没有对同类事物的了解，我们不可能作出任何有意义的论说。事物对我们来说，仅仅是空洞地、无内涵地存在着。

近似地，尤其当下——对于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仅仅是“空洞地、无内涵地存在着”。当下，对我们而言，是并且只是一个事实。我们难以审视它们，我们不能体察到它们的特异之处，由此，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建立在熟视无睹之上。更进一步，我们的思考本身就已经不自觉地将当下视为某种前提、某种先定秩序：这就是说，现实背后的力量穿透了我们，至少是严重扭曲了我们的经验。在这一意义上，对中国最不了解的人恰恰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知道得太多，所以一无所感。

当自己的经验都已不可信任时，追问在那些熟视无睹的事物背后究竟还有什么，似乎已无可能。就因为此，我们绝不应该认为自己了解这个所知最多的国家。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如此比较，或许才能够体认到当下的具体问题。此即所谓“声西击东”：声泰西之学以击东方之是也。

第一部分 一本正经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

古今之争：基础主义之思

—

在古希腊时代，伦理学还是一个前现代的学科，其关注焦点还停留在“何为良善”的层次；之后，在古罗马时期，这一学科的关注焦点就转变为研究良善行为的内在意义。也就是说，在人们对道德标准已取得基本共识后，伦理思考的要务就会随之变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这种现代转型的并不是哲人的作为，而是知识社会学所称的“外部原因”：社会环境的自然变化。

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出现，并非始于英国革命或启蒙运动，更非始于施特劳斯及马基雅维利，而应当始于罗马共和国之为跨民族国家之时。跨民族国家就意味着跨文化国家，至此，文化多元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古希腊时代为哲人所重视的“自然”、“习俗”甚至传统本身，都丧失了原先的重要性。“政治”这一概念的内涵，由族群-城邦之事务，转变为跨文化社会之事务；由道德同质化社会之内部（所有）事务，转变为诸共同体共存之外部事务。作为族群特质的文化，对于某个民族而言依然重要，但从政治与国家的角度看来，则仅仅是社群内部的问题。